

谢冕 张颐武 著

大转型

后新时期文化研究

- 90年代中国文化大转型
- 大众文化论
- 思想论 · 文坛论 · 大众文化论
- 当代北京文学研究
- 散文 · 杂文 · 小说 · 诗歌 · 戏剧 · 电影 · 电视 · 网络
- 杂文 · 杂文 · 杂文 · 杂文 · 杂文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G122
31

大转型

——
后新时期文化研究

95543

谢斌
张顺武
著

(黑)新登字第5号

大 转 型

——后新时期文化研究

谢 冕 张颐武 著

责任编辑:李 彤 王爱琳

封面设计:孙少江

责任校对:曾一丹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158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 14.125·字数 335 千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 500

ISBN 7-5316-2830-9/C·72 定价:13.60 元

目 录

| | |
|-----|---|
| 导 论 | 1 |
|-----|---|

第一编 思潮论

| | |
|------------------|----|
| 第一章 “后新时期”与文化转型 | 29 |
| 第二章 跨入新空间 | 46 |
| 第三章 “知识”与“价值”的选择 | 74 |

第二编 文学论

| | |
|------------------------|-----|
| 第四章 走向 90 年代的抉择 | 93 |
| 第五章 探寻与追问 | 122 |
| 第六章 “陕军东征”及地域文化的挑战 | 148 |
| 第七章 新移民文学:寻找新空间 | 173 |
| 第八章 寻找时代的生命 | 184 |
| 第九章 文化与精神的镜像 | 217 |
| 第十章 诗歌的困境和消费化倾向 | 252 |
| 第十一章 后新诗潮与后新时期:诗歌的时代转型 | 265 |
| 第十二章 诗美的哗变:传统的逆反与变异 | 277 |
| 第十三章 散文:沉寂过后的萌动 | 311 |

12207/21

第三编 大众文化论

| | |
|------------------------------------|------------|
| 第十四章 电视与文化消费..... | 345 |
| 第十五章 中国电影:分裂的挑战 | 393 |
| 第十六章 张艺谋现象与“后殖民”..... | 408 |
| | |
| 附录一:有关“后新时期”的讨论七篇 | 424 |
| 附录二:关于“后新时期”文学的研讨(报导) | 443 |
| | |
| 后 记..... | 446 |

导论：从“现代性”到“中华性”

进入 90 年代以来，中国文化以及它置身其中的世界文化语境，正在发生新的巨大变化。我们已有的既成理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传统、现实和未来的种种矛盾纠结在这个关口。统一的声音消失在众声喧哗的轰鸣之中。这种新的文化状况呼唤新的具有阐释效力的理论话语的生成。我们无法回避。面对这种新召唤，在当前众声喧哗的条件下，人们自可以从不同角度作出自己的应对。作为从事理论批评的人文科学工作者，我们感到有必要提出我们的初步思考。这种思考仅仅是要汇入当前文化选择的种种潮流之中。

我们思考的焦点是文化赖以建立的基本话语范型即知识型。知识型作为文化的话语表征，它的变化与文化的转型密切相关。目前有关文化转型的讨论实际上都或隐或显地涉及知识型的变化。因此，我们不得不切入这种知识型的变化，由此把握中国文化的当下状况及其未来走向。

一、“现代性”及其中国命运

现代性，是用以表述 1840 年以来，尤其是整个 20 世纪中国文化的知识型的概念。知识型的主要工作，是确定特定文化的性质及

其在世界中的角色——即为文化获得定义提供基本话语规范。一种文化不可能自己定义自己，只有通过“他者”才能定义自己，各种“他者”的总和构成该文化所认为的“世界就是这样的”的世界图景。这个世界图景是由一套知识型所形成并存在于这套知识型之中的。于是文化就运用这套知识型并在这个世界图景中去创造和获得自己的地位。古往今来，中国文化形成了自己的两大知识型：古典性和现代性。因而我们要明了现代性，还应从古典性谈起。

在1840年这个不祥年份悄然来临之前，中国尚处于“天朝大国”特有的自足与完满中，享受着世界之中心的古典性荣耀。它通过与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上的反复“对话”，得出了夷夏的等级世界图景，确认了自己（夏）的中心地位和文化的先进性，规定了四夷的从属地位和文化的落后性，这个以华夏为中心的古典性世界图景延续了数千年。“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并吞八荒”的气概^①，“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王维）的盛景，通过历代文物典籍，在中华民族的内心积淀了深厚的中心化情结。

然而，鸦片战争打破了这幅古典性图景的宁静。中国人长期的中心美梦，终于在西方人坚船利炮的轰击下毁灭。最紧迫的危机在于，人们于突然间发现，中国已不再是世界的中心，而成了世界的边缘；不再是世界文化“对话”中的强者，而沦为弱者。似乎正是借助于强悍而陌生的西方“他者”这面镜子，中国人才第一次发现自我的如此真实面目；而在发现这一自我的同时，也就已经失去了自我。发现自我与失去自我是同一回事。因为，如果没有西方他者的强行介入，就不会失去作为世界中心的自我，从而也就不会发现自我中心的失去了。

面对中心幻想破灭这一灾难性事实，中国人渴求找到一种中心话语体系，以便在此基点上重建中国在世界话语格局中的中心

权威形象。如果说，中心幻觉的破灭和对中心幻觉的追认可以作为中国的古典性的终结的标志的话，那么，中心破灭中的重建则成为中国的现代性的核心话题。

现代性，本来在西方语境中指宗教“神圣天篷”解魅以来，以启蒙主义为核心的文化合理性工程，涉及哈贝马斯所概括的认识—工具合理性、道德—实践合理性和审美—表现合理性诸方面^②。在中国语境中，它则有了新的独特含义：主要指丧失中心后被迫以西方现代性为参照系以便重建中心的启蒙与救亡工程。这一中心重建工程的构想及其进展是同如下情形相伴随的：中国承认了西方描绘的以等级制和线型历史为特征的世界图景。这样，西方他者的规范在中国重建中心的变革运动中，无意识地移位为中国自己的规范，成为中国定义自身的根据。在这里，“他性”无意识地渗入“我性”之中。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如下事实：中国的“他者化”竟成为中国现代性的基本特色所在，也就是说，中国现代变革的过程往往同时又显现为一种“他者化”的过程。于是，在鸦片战争以来一个半世纪的风风雨雨中，中国人一次次试图重建中心，但又总是发现它的陌生与虚幻性。技术主导、政体主导、科学主导、主权主导和文化主导，是这期间先后有过的五次重心转移^③。由此我们不难窥见中国的现代性的展开和完结的必然命运。

（一）技术主导期

被西方大炮惊醒古典性美梦后，林则徐、魏源、冯桂芬、曾国藩、李鸿章和张之洞等开始紧张地反省中国失落中心的原因。作为中国第一代现代思想家和政治家，他们从鸦片战争失败的惨痛教训中推断出，中国的败因在于技术的落后，技不如人。承认技术落后于“西夷”，这对于一向以中心自倨自傲的中国人来讲，并非易事。它既表明中国的自我中心幻觉仅初损而无大碍，同时又透露出面对他者威慑的无可奈何。这批洋务自强人物相信，中国仍具中心

实力,只要学习西方技术,就能重新自强,反过来制服西方,即“师夷长技以制夷”。他们的理论依据是“变器不变道”。中国固有的根本价值规范(道)是不必改变的,而作为它的具体显现的技术(器)却可以变通。从而“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④。也正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命题所概括的,以中国自己的话语规范为本体或根本,而以西方的技术为它的实际展开或细枝末节。于是,中国重返中心的现代性工程焦点就沉落在技术上。似乎在不改变中国既成根本价值体系的前提下,只要引进并掌握西方先进技术,就能富国强兵,再度拥有中心权威,即“取西方人之器数,以卫我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⑤。

然而,技术之路并不平坦。倾心于并实践洋务理想的刘鹗,曾在《老残游记》第一回里寓言式地再现了上述技术主导主张及其必然命运。那艘海上遇险、伤痕遍体、即将倾覆的客轮,无疑是陷入中心危机的中国的写照,而老残送罗盘和纪限仪上船救险,正可以视为以西洋先进技术拯救中国的技术主导论的具现。但是,与老残遭下等水手、欺世“英雄”和愚昧乘客的合力陷害而葬身海底相似,洋务派的技术救国理想不得不随着甲午中日海战中国的惨败而鸣响丧钟。素来被置于边缘弱国的日本取代中国迅速成为亚洲新中心,这一严酷现实更使人们认识到,“变器不变道”的技术主导论不能解决中国的现代性的根本问题。

(二)政体主导期

埋葬了技术主导论,政体的变革成为重返中心的新的主导思想。它给人们展现出两条道路。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可以理直气壮地推行维新变法方略。康有为的“道可变”、“道各不同”取代了洋务派“变器不变道”之说,谭嗣同以“器既变,道安得独不变”铺设出道器与体用一致的思路。在这基础上,他们提出了全面的政体改

良思想,即在君主立宪制的框架上实行政权、司法、立法、教育等的改良。而另一方面,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反对维新派的政体改良方案,但同时又提出另一种政体改革主张,以民主政体代替立宪政体。他们的“富强之学”是要以民主政体为核心寻求中国的全面“振兴”。

无论是维新派还是革命派,拯救的焦点都凝聚到政体上。对他们而言,技术运用只能解决枝节问题,只有彻底的政体变革,才是中国重返中心的必由之路。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政体中心论的规范同样是出于西方“他者”的馈赠。

来自西方的政体规范是否能直接在中国大地生根?在未完成的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1903)里,梁启超虚构出维新运动的理想型圣贤黄克强,让他连篇累牍地宣传君主立宪思想。从这位长于思想而短于行动的理想型人物身上,我们不难感受到维新派的脱离中国传统与现实的主观性放纵。革命论者陈天华作《狮子吼》(1905),构想出舟山群岛上的西式桃花源——民权村,那里按西方现代性规范培育出狄必攘等革命群豪,派他们潜回内地策动武装暴动,目的是“造就新邦,重开汤武之天,净洗犬羊之窟”。不过,幻想出的西式英雄毕竟无法拯救中国于水火之中,同理,革命派的西方式民主政体理想难以植根在中国的土壤里。因此,由于忽视中国实际而片面放纵主观性,政体主导论也只能品尝失败的苦果。

(三)科学主导期

按孙中山的政体主导设想而完成的辛亥革命,仅仅赶跑了皇帝,并没有带来中国的真正变革。《药》中的华老栓父子依旧愚昧地以人血馒头治痲病,缺乏科学思想的武装。《祝福》里备受苦难而不甘屈服的农村妇女祥林嫂,迷信死后会在阴间遭受灵魂分裂的折磨。披阅《狂人日记》,我们读到人吃人的蒙昧竟弥漫整个中华历史,并且仍然死死缠住现代读史者的灵魂。据“五四”启蒙思想家如

陈独秀、胡适和鲁迅等的诊断，中国病的症候正在于来自自身传统的“愚昧”或“蒙昧”，而医治的药方则是现代“科学”。在他们眼里，只有“科学”才能为中国的中心化铺路搭桥。技术的运用、政体的变革，都必须以“科学”的“启蒙”为必要前提。“民主”（德先生）诚然可与“科学”（赛先生）并列为两大偶像，但它的基础却是“科学”。所以，陈独秀有理由把“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列为《敬告青年》（1915）“六义”中最后和最根本的一“义”，强调欲“根治”中国的“蒙昧”，唯有“科学”。

但这里的“科学”却并不植根于中国传统，而完全属于西方“舶来品”。相反，中国固有的“工”、“农”、“医”、“商”等则简单地被贬作“惑世诬民”的“迷信”之说。来自西方的“科学”确实有助于驱散中国传统中的迷信烟雾，然而，这种西方“他者之学”真的就能自外妥贴地嵌入中国文化躯体么？同时，中国传统学问真的就全然一派“迷信”么？“五四”思想家中不乏冷静而务实的头脑（如鲁迅），认识到“他者之学”应与自身传统的再生结合起来；但当他们因过分敏感于传统“黑暗闸门”之沉重而力求全盘地反传统时，西方“科学”就成了他们的反抗的合适的利器，而中国传统本身的生命力则相对地暂时被冷落了^⑥。

这样，继技术主导和政体主导之后，中国的现代性（或“他者化”）进程凝定到科学主导上。按一些当代论者推断，“五四”精神的核心正是科学“启蒙”。西方科学的光芒一旦开启蒙昧的中国心智（即“启蒙”），中心的重建就有救了。在我们看来，这不过是一种科学救国幻觉。单纯依仗科学而遗忘文化的其他方面，是不可能实现中心重建的宏图的。

（四）主权主导期

30年代，日本全面侵略中国，加速了本已危机重重的科学主导论的幻灭。国土被瓜分、国民遭蹂躏的深重灾难，迫使人们转而

把捍卫国家主权当作中国重返中心的关键。于是，从30年代到“文化大革命”近半个世纪，主权问题一直成为中国现代性的主导性问题。

对一个屡受外族欺侮而“半殖民地化”的国家来说，恢复自身主权即“救亡”，确实比科学“启蒙”及其它都远为迫切而重要。正由于此，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1940)里把国家的“独立”规定为中国革命的第一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结束了中国的四分五裂历史，标志着国家主权的重建胜利完成。

然而，重新拥有国家主权后，这个具有深厚的自我中心情结的国度，却发现自己并没有因此而重温中心旧梦，至少，与其它中心权威平起平坐的权利也未获得。人们从而明白，没有中心地位便没有真正的国家主权。现实情形是，美国和前苏联这“冷战”的“他者”两极都把中国排挤在中心大国之外。而早在雅尔塔会议上，中国的边缘角色就已被别人给确定了。这是西方“他者”强加于“我”的事实，自然无法让自以为已具备中心实力或不甘于非中心命运的“我”承受。于是，为了摆脱这种“中心化”或“他者化”焦虑，“斗争”理论出现了：对外有“三个世界”模式，与帝修反斗争，意识形态论战(如“九评”)；对内与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右倾分子、走资派等形形色色阶级敌人“斗”，而且常常采用大规模政治“运动”方式。“文化大革命”正是“斗争”理论的极端膨胀的展现。人们相信，“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对外对内的不停顿的绝对“斗争”，被当作令中国重争主权即重返中心的第一“法宝”。

虚构的审美世界向我们展示了这种“斗争”模式的置换形态。《创业史》中“新人”梁生宝不得不与富农、富裕中农、党内异己分子甚至自己的继父作坚决“斗争”，发展到高大泉的“芳草地”世界，从中央到村镇的整个社会关系网络竟层层硝烟弥漫。而这一切又被

认为不过是从战争年代起就代代相传的“红灯”精神的延续与发扬。在由李奶奶、李玉和、李铁梅组成的三代非血缘家庭模式中，不停顿的绝对斗争精神获得其典范形态。“红灯高举闪闪亮，照我爹爹打豺狼，祖祖孙孙打下去，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重要的是，这里作为斗争对象的敌人如姚士杰、郭振山、张金发、冯少怀和鸠山等，仿佛是那夺我国家主权、毁我中心地位的强暴“他者”的置换。与这些“他者”作斗争并取得胜，正可以象征性地使人们的极度“他者化”或“中心化”焦虑得以暂时缓解。

但事与愿违。以斗争方式不仅并未争得主权（中心），相反却由于它的极端失范而导致国家滑向毁灭的边缘。以主权为主导，同过去以技术、政体或科学为主导一样，没能确保中国重归中心。

（五）文化主导期

“文革”结束和“新时期”开始，俨然一道分水岭，划开了旧的主权主导期和新的文化主导期。文化，作为组织人们的技术、政体、科学和主权等社会行为的基本的元话语或元模式，被视为中国的现代性或中心化航船的新的启锚地。在历经并告别了以上种种主导性尝试以后，人们发现文化是上述种种主导的主导，是更根本的方面，从而把关注点推移到对鸦片战争以来的现代史、乃至整个五千年中国史的全面而深刻的文化反省上。似乎只要认清中国的文化情势，重返中心便有指望了。

在此过程中，由于闭关 20 年后蓦然对外开放，中国人惊异于西方及周边亚洲国家的飞速发展，对比之下则是自身与中心的差距反而愈拉愈大了。这种中西文化比较带来的结果是：西方被确认为高级文化、中心文化，因为它的元话语是求变求异的；中国则是低级文化、边缘文化，因为它受制于“超稳定结构”这元话语。于是就出现黄色文明已然衰落、蓝色海洋方是唯一归宿的激烈呼声。在这种激进姿态驱使下，不是中国本土元话语而是西方元话语，被当

做“东方的复兴”的基本规范。这样，以文化为主导，就意味着中国在变革自我时实际上陷入全面“他者化”境遇，即把西方“他者”的元话语作为中国的元话语，以西方的道路为中国重返中心之路。

这条激进言路在今天看来难免偏执，但却频频激起回声。“寻根”文学本意是要寻觅中华文化之“根”，其结果却是寻出丙崽那样的畸形儿。那一度魅力四溢的现代“卡里斯马”典型，如今被“非英雄”、“反英雄”或“非典型”所取代。“新写实”或“实验”小说的锋芒，直逼根本性的元叙述体。它们不约而同地启悟人们，昔日曾结满中心果实的中华文化之“根”已不可救药，新的希望在于向西方“他者”认同。难道说，唯有西方或海洋文明才是中国现代性航船的抛锚地？

到此为止，中国的现代性或中心化进程已经历五个阶段：技术主导、政体主导、科学主导、主权主导和文化主导。然而历史除人们的主观努力激起的浪峰外，还有内在的潜流在自然地奔腾翻滚。是存在的就必然会浮出表面，历史推移到 90 年代，作为以西方话语为参照系以重建中心的启蒙与救亡工程，这一现代性“神圣天篷”还能继续笼盖新的现实吗？

二、后新时期：众声喧哗的时刻

进入 90 年代，中国的文化状况发生了极其引人注目的转变。从 70 年代后期开始的“新时期”文化正在走向终结，各个文化领域都出现了转型的明确征兆。有学者将这一文化的新变化定名为“后新时期”。关于“后新时期”文化的讨论目前正在进行。但一般认为，“后新时期”是对 90 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文化新变化的概括，它既是一个分期的概念，又是对文化中出现的众多新现象的归纳和描述。它既意味着新时期以来的理想精神和文化热情的结束，又意味着

一个社会市场化进程中的第三世界民族的诸种新的可能性的开始。它是一个力图跨出“他者化”的新的时代，也是一个重审“现代性”的时代。

可以从两个事件开始我们的分析。一个是1989年2月在中国美术馆举行的“中国现代艺术展”。这个展览充分地展示了“新时期”以来中国前卫艺术的主要成果。这是一次总结的企图，一次概括与归纳的尝试。但它所展现的却是极其含混和片断性的东西。现代/后现代的文本杂乱无章地拼凑在一起，而《对话》以枪击完成创作又引起了对对话与沟通的不可能的极度焦灼与不安。整个展览弥漫着强烈的困惑和矛盾。这是一个明确的象征：我们在试图总结过去的时候，却悄悄地划定了我们与过去间的界限。那个“禁止掉头”的标志喻示着一个充满热情的、执著的“现代性”追寻的时期已经悄然逝去。这个事件正像有论者所言，“将整个80年代艺术送上了断头台”^②。这个说法多少有点戏剧化，但还是相当传神的。另一个征兆是诗人海子于1989年3月在山海关卧轨自杀。这是一个试图用宏大的规模表现人类和世界的诗人，一个狂热地追寻整体性的诗人，他的《太阳》《弥赛亚》等长诗都试图创造一种综合性的“大诗”的新形式。在能指/所指、语言/实在间重新建立一种联系，使世界可以在语言之中得以展示。但他的死却是一次用身体的毁灭所进行的象征行为，他宣告了这种努力的无望性，也最终告别了世界和语言。这两个事件划开了界限，使新时期文化话语的许多关键性的原则受到了震撼和质疑。它们是一次告别、一次洗礼、一次突发式的断裂、一个象征性的界标。它们不仅仅意味着80年代“新时期”文化的终结，也意味着“现代性”伟大寻求的幻灭。

这里的转变是涉及各个领域的，是汉语文化面对“冷战后”新世界格局所产生的巨大变动的核心部分。这里发生的转变有两个背景值得提出讨论。一是中国大陆文化与西方文化及港台文化的

互动关系进一步加深。与国际贸易和跨国资本的进一步投入相适应,当代社会的国际化程度进一步加强,并随着卫星电视、计算机软件和有线电视等高技术的发展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文化本身的世界性已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像张艺谋电影在国际电影节中的多次获奖及中国电影的海外市场的循环形成,香港及台湾娱乐界以巨大的规模进军大陆市场,都标志着文化将进一步面对国际交流与竞争。原本在国内可以认识和了解的现象,也被植入了一个大的背景之中。二是当代主流文化自身也发生了适应市场化的转变。主流文化也变成了市场背景下的多样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也是90年代文化转变的一个重要的背景,它意味着意识形态及文化话语的构成方式由“硬”性转为“软”性,加入了文化的市场之中,试图在选择中依靠其自身魅力获得新的发展。这两个背景的存在,意味着大陆中国原有的文化规范性、支配性因素不但没有强化,反而进一步丰富化了。这种丰富化产生了众多选择的可能,影响着90年代到21世纪中国大陆文化的走向。那么,目前文化究竟表现出怎样的特性,怎样显示了自身与1840年以来中国“现代性”文化不同的表征,是我们面对的主要问题。我们以为下列三个方面的发展具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社会的市场化

社会的市场化不仅仅是社会本身转变的结果,也是中国国家机关和社会部门的自觉而明智的选择。它不仅仅是社会经济部门转型的过程,也是文化自身的转变。“市场化”意味着“他者化”焦虑的弱化和民族文化自我定位的新可能。正是由于“他者化”焦虑产生了“迎头赶上”“大跃进”式的自我丧失的痛苦和急躁,而市场化的结果,必然使旧的“伟大叙事”产生的失衡状态被超越,而这种失衡所造成的社会震撼和文化失落也有了被整合的可能。所谓“市场化”并不意味着对“现代性”设计的全面认同,而是面对后工业文明

的新的选择,它不再以西方或前苏联式的现代模式为前提,而是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的选择、一条民族的自我认证和自我发现的新道路。在这里,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总体设计不再以西方式的话语规范或前东欧、苏联式的话语规范彻底规约自身,而是经过了痛苦的探索,提出了以“小康”为中心的文化取向。小康不仅是一个经济发展的指标,也是一种文化发展的目标,它还意味着一种跨出现代性的、放弃西方式的发展梦想的方略。它不再将西方视为中国必须赶超的“他者”,而是悉心关切民族文化特性和独特的文明的延展和转化。“小康”象征着一种温馨、和谐、安宁、适度的新生活方式和新价值观念的形成,它是一种超越焦灼的新的策略。“市场化”不是以西方式的价值为前提和基础的,而是以“小康”的观念为基础的,它所构筑的不是一个经典的“现代性”的“发展”意识形态,而是对这种“发展”观的超越和重造。

在“市场化”的小康取向之中的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有三个方面:

A. 大众传媒化

文化的大众传媒化的主要象征,是高度商品化的大众传播媒介在文化中的支配地位的增强。广告、电视肥皂剧、MTV、报纸的周末版、月末版等,都开始产生巨大的影响。大众传媒已逐渐由主流话语的宣传性运作转向了商业导向的消费运作,其功能和性质都已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渴望》作为成功的电视肥皂剧的制作,极好地标志了大众传媒的新的功能和性质。《渴望》这个关于善良的中国女性刘慧芳忍受一切痛苦的感伤故事,那首“恩怨忘却,留下真情从头说,相伴人间万家灯火”的哀婉的歌声,无不是传媒对大众文化心理的精妙把握和控制。在《渴望》中,中国大陆传媒成功地将商业性的取向与文化自身变动的方向作了缝合。同时,每次与《渴望》同时播出的家庭卫生间用品“代劳力”的广告,更说明了